

● 元仁山 著

黑龙江资本主义工商业的 社会主义改造简史

黑龙江

前 言

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自上而下的和平的方法逐步地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最后实现马克思和列宁曾经设想过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邓小平同志指出，“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是我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最光辉的胜利之一。这个胜利的取得，是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工人阶级执行了毛泽东同志根据我国情况制定的马克思主义政策，同时，资本家阶级中的进步分子和大多数人在接受改造方面也起了有益的配合作用。”在这里，邓小平同志高度评价了在我国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历史意义，总结了取得这个胜利的两条最根本的经验。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正确地认识到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不同革命时期的特点，即在民主革命时期中的革命和妥协的两面性，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中的唯利是图、剥削工人和拥护宪法、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两面性。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这个特点出发，中国共产党采取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采取对民族资产阶级团结批评教育的政策；采取对企业的改造和人的改造相结合的方针，最后成功地以和平的方法把生产资料私有制改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了这个阶级，并把这个阶级中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的确是一个伟大的创举。虽然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存在着一些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和偏差，但它毕竟是次要的、第二位的，决

不能由于有这些缺点和偏差而否定这一伟大胜利。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黑龙江省也胜利地完成了如此复杂、困难而深刻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对黑龙江省来说，也是一件伟大的历史性胜利。黑龙江省是老解放区，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黑龙江省各地相继解放，建立了各级人民政府。本书主要阐述了从1945年9月至1956年末期间，在党的领导下所进行的黑龙江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为了让读者了解解放前黑龙江民族工商业的情况，在本书第一章里简要地叙述了从20世纪初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的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情况和伪满洲国时期民族工商业所遭到的摧残。作者虽然经过几年的搜集资料和研究，力争实事求是地、全面地叙述黑龙江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但由于水平所限，加上所掌握的资料不全，难免存在缺点和不足之处，恳请参与或领导过这项工作的老同志、史学工作者和广大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八一五”光复前的黑龙江民族工商业.....	(1)
第一节 20世纪初民族工商业的发展.....	(1)
第二节 伪满洲国时期民族工商业的遭遇.....	(23)
第二章 解放战争时期民族工商业的恢复与发展.....	(36)
第一节 贯彻党对民族工商业的政策.....	(36)
第二节 反奸清算斗争和“砍挖”运动中 保护民族工商业.....	(43)
第三节 扶植和发展民族工商业.....	(53)
第四节 把民族工商业引向国家资本主义道路.....	(61)
第五节 提倡劳资合作,实行分红制度.....	(65)
第六节 加强管理,取缔惩办投机倒把.....	(70)
第三章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资本主义工商业.....	(77)
第一节 贯彻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	(77)
第二节 调整公私、劳资、产销三个关系.....	(85)
第三节 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支援抗美援朝战争.....	(104)
第四节 开展“五反”运动.....	(113)
第五节 坚持“五反”斗争与生产两不误.....	(132)
第四章 深入进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 社会主义改造.....	(137)
第一节 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后进一步 调整公私关系.....	(137)

第二节	贯彻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改造政策.....	(140)
第三节	整顿与健全工商联组织，加强思想政治教育.....	(151)
第四节	私营工商业中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的发展.....	(155)
第五章	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	(163)
第一节	完成全行业公私合营.....	(163)
第二节	私营房产和私营交通运输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75)
第三节	妥善处理清产核资与人事安排，实行定息.....	(178)
第四节	纠正偏差，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	(181)
第五节	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促进思想改造.....	(189)
附录：大事记	(1945年8月—1956年12月)	(196)
后记		(243)

第一章 “八一五”光复前的 黑龙江民族工商业

第一节 20世纪初民族工商业的发展

封建社会内部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要产生资本主义。在中国于18世纪中叶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随后一些行业逐渐发展成为现代资本主义企业。到19世纪中期，英法等列强入侵，加速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进程。由于外国资本的入侵，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和城市手工业、农民的家庭手工业，进一步促进了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从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起，在中国次第产生了外国资本、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三种资本主义经济形态。民族资本主要经营织丝、棉纺、面粉、火柴等轻工业和煤矿等。但是，民族资本在外国资本主义的打击和封建势力的束缚之下，发展缓慢，到1894年民族工商业只有160家，投资额722.5万元，远远落后于外国资本和官僚资本。中日甲午战争以后，由于清政府被迫放松对民族资本的控制，群众掀起抵制外货的爱国运动，不断增强了民族资本的投资额。到1913年，民族资本的投资达15498.7万元，高于官僚资本的投资额，1914年民族资本投资一万元以上的企业已有549个。

与全国相比，在黑龙江资本主义产生较迟，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极为缓慢。清朝统治者夺取全国政权之后，从1668年（康熙七年）起，将东北划为禁区，不允许关内人民出关携眷居住、

种地谋生，历行长达192年的封禁政策。由于清朝统治者实行封禁政策，出关前来东北贸易的商人稀少，在黑龙江省封建社会内部的商品经济无法发展，手工业和科学文化长期处于落后状态。在地广人稀的黑龙江省，造成绝大部分地区只有人游牧，或者连游牧者也很少，生产落后、政治腐败、人民穷困的局面。而清朝统治者把东北视为自己一族的私有，不准其他民族出关前来定居垦殖的局面未能抵挡国内外的压力，到1860年终究被迫弛禁。1840年鸦片战争打开了“闭关自守”的中国大门，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开始入侵东北。英美的烟商收买中国奸商偷运鸦片到关东，破坏了清朝统治者视为“根本重地”的宁静，官丁旗民染上了吸食鸦片的恶习，出现了“明易货物、暗销烟”的场所，外国烟商掠夺东北的特产。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资本主义列强在东北强开商埠，设领坐劫。外国人在东北取得了居住、赁房、买屋及租地起造礼拜堂、医院、坟墓等特权，并且随意到各处游历、通商。因此，大量的洋货在东北倾销，使东北原有的手工纺织业和冶铁业等遭到破坏，使东北的白银和原料大量被榨取走。1881年至1891年间，东北的大豆、豆饼、豆油、毛皮、人参、鹿茸等出口量增加了一倍；柞蚕丝，1880年以前的出口量不超过一、二百担，而1886年后每年均出口五、六千担，竟增加了30倍。洋货如斜纹布、粗布、条布、铁条、钢板、洋铁、煤油、火柴等输入量年年激增，从1882年至1891年间增加了两倍多，洋纱竟增加了一万多倍。与此同时，外国人在东北投资设立了机器榨油厂，把大豆在当地榨油后运走。因而东北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遭到破坏，东北资源被列强残酷掠夺。这是清政府因外来侵略而被迫开禁东北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国内大量难民流入东北，迫使清政府开禁东北。鸦片战争后，关内山东、河北一带的人民为活路、谋生存，大量闯关东定居垦殖。这些难民在1860年黑龙江省呼兰地区私垦地达8千垧之多。清朝统治者把这些流入东北的广大流民视

为非法的垦荒者，没收私垦地，因而迫使流民们奋引反抗。阿城、依兰、呼兰一带的广大流民起义，有力地配合了辽宁地区的流民起义，打击了清朝统治者。这些为争夺生存权的起义，迫使清朝统治者作些让步。清朝政府为了防止起义向全国蔓延，抵御俄国人的南侵，利用流民的开垦就地生财，从1860年起部分地放弃了封禁政策。因而，比较先进的汉族人民和各民族人民前来东北定居垦殖，带来先进的农业技术，以渔猎为主的当地人民也受“讲习农事”，大大促进了东北地区的农业生产的发展。据1808年统计，在黑龙江地区只有13万6千余人。到1888年仅在黑龙江的青岗、兰西、呼兰、巴彦、绥化等地汉族人民已达20万户，官、私垦地共有150多万顷。汉族人民的大量流入，不仅农业生产有了发展，而且活跃了交换，增多了商贾，加速了手工业、采矿业和交通事业等方面的发展，许多新兴的村落、城镇也逐渐形成。绥化、巴彦、呼兰竟“三城相望，粮产富饶，商贾云集，汉民居户不下十有余万……”^①

上述包括黑龙江在内的东北地区的这些变化，促进了黑龙江的工商业发展。在外国资本逐步增加，官僚资本依旧存在的情况下，民族资本也开始出现。随着生产的发展和流通领域的扩大，出现了投资规模极小的私人工商业者。但是，由于黑龙江地处边陲，交通不发达，较大的城镇尚未形成，商品经济发展比关内落后，因此以手工作业和短途贩运为主的私人工商业无法迅速发展。

到了20世纪初，随着中东铁路的建成，外国资本的不断入侵，中等城市的涌现，黑龙江省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开始有了发展。1894年至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虽然在俄、德、法三国的逼迫下，放弃了整个辽东半岛的割占，但清朝政府仍承担对日本赔款白银二万万两。可是清朝政府无力按期交出这笔巨

^① 《黑龙江述略》卷二，第11页。

款，只好向外国借债。俄国闻讯后，为了在经济上控制中国的全部财政和经济命脉，1885年7月与清朝政府签订了《俄法洋款合同》。合同规定，中国借俄、法银行洋款4亿法郎（约相当于白银一万万两），年利四厘，36年还清，中国以海关收入作保，并不得另向他国借款。接着俄国在中国设立其进行殖民事业的金融机构即“华俄道胜银行”分行或代理处。在13个分行中，有哈尔滨、满洲里分行。“华俄道胜银行”章程中规定，该银行可在中国发展商务、承包税收、经营国库业务、发行货币，还可在中国修筑铁路、架设电线。俄国为了控制中国，独霸东北，除了靠借款和银行以外，于1896年6月与清朝政府以中俄共同防止日本侵略为词，签订了《中俄密约》（《中俄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在《中俄密约》中规定，由“华俄道胜银行”在黑龙江、吉林续建铁路达海参崴，平时和战时俄国均可运送军队、粮食和军火。这样俄国在东北进一步取得了从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的更大权益。《中俄密约》的重要内容是修筑中东铁路问题。因此，俄国迫不及待地于同年9月同清朝政府签订了《中东铁路合同》（《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取得了由满洲里起经齐齐哈尔、哈尔滨、牡丹江、绥芬河的筑路权和通过这条铁路免费运送军队、军火、减税、免税运输货物的权利，取得了占领铁路沿线土地和行政的特权。“中东铁路建设局”于1897年8月开始筑路，第二年“中东铁路建设局”的机关由伯力迁到哈尔滨。1898年，俄国再次迫使清朝政府签订了《东省铁路公司续订合同》，攫取了从哈尔滨起经长春到旅大的中东铁路支线的修筑权和经理权。通过中东铁路的修筑，俄国把侵略势力伸入了东北，俄国财政大臣维特毫不掩饰地说，这“不仅有经济意义”，还有“政治的及战略的意义”。中东铁路的修建，加速了外国资本对黑龙江的入侵，与此同时黑龙江与东北其他地方的贸易往来以及对外通商贸易往来带来了方便条件，因而不仅当地私人工商业者拔地而

起，而且关内商人也携眷来黑龙江定居。随着通商贸易的发展，人口逐渐增多，昔日少量渔民散居的哈尔滨很快发展成为黑龙江的中心城市，以农副产品为主的集散地也成为外国资本家攫取黑龙江特产的重要基地。随着中东铁路的建筑，俄国在哈尔滨创建了三十六棚铁路工厂；1900年中东铁路投资38.4万卢布，在哈尔滨创建了第一个机器制粉厂，即“第一满洲制粉厂”；1902年修建了中东铁路直营的第一松花江面粉厂。俄国商人也纷纷投资制粉业，先后创办了戛瓦林司克伊制粉厂、俄罗斯制粉公司、德丘果夫制粉厂、地烈金制粉厂、东洋制粉厂等。这些俄国资本经营的制粉厂，不仅满足了中东铁路沿线的粮食需要，而且加工出来的面粉行销东北各地和俄国境内，从中榨取高超利润，使用了大批当地的廉价华工。随着中东铁路的修筑，关内商人的来住、定居，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佳木斯等城市逐渐形成，在这些城市和其他县城里民族工商业也开始发展起来了。这个时期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其数量增多，号称北满三大工业的制粉、制油和酿酒业开始形成。1900年，中国商人张波祥在哈尔滨建立了满洲面粉制造公司。1902年，在齐齐哈尔，天增顺铁匠炉开业，它主要为农村加工铁铧犁等农具。1902年，王翠亭在牡丹江开设土榨油房——“西生栈”。在商业方面，做小本生意，出售山海杂货、小百货、小五金、日杂、食品和土特产的小商贩逐年增多，私营中药商业也开始出现。例如，1857年在宁安县大小铺商共有183家，到1904年，全县的私营商业和手工业作坊发展到695家。1904年，山东人杨立春、王恒五到依兰县城开设洪泰祥、永盛德杂货店兼粮栈，河北人杨占魁、房寿铭、惠子敬等人也到依兰县城开设德庆昌药店、德泰源药店，本地人王否卿、宁凌波等人开设了源聚东杂货店兼粮栈。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这场战争是日俄为它们在东北和朝鲜的利益而进行的战争。经过一年多的战争后于1905年日俄签订

了《朴茨茅斯和约》。和约规定：俄国承认朝鲜为日本势力范围，并将它从中国攫取到的辽东半岛（包括旅顺和大连）的一切权益和长春到旅顺的铁路及其支线的一切权利、财产让给日本。可见《朴茨茅斯和约》是日俄双方瓜分霸占东北的条约。此后，日本和清朝政府签订了《中日满洲善后条约》和附约，日本取得了在辽阳、新民、长春、吉林、哈尔滨、宁安、依兰、齐齐哈尔、满洲里等十几个地方开商埠的权利。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进一步加强对东北的侵略，在沈阳和哈尔滨设立总领事馆，在安东、吉林、长春、辽阳、铁岭、齐齐哈尔等地设立了领事馆和领事分馆。日俄战争后，俄国和日本对东北加紧了资本输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东北近代工业的发展和商业贸易。与此同时，收回利权和设厂自救的爱国运动的兴起及清政府奖励工商业的政策，也促进了东北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日本在南满修建制粉工厂，并输入大量的日本面粉，俄国人在中东铁路沿线修建了大小19个制粉厂。1912年俄国人吉比布尔在哈尔滨独资开办了吉比布尔铁工厂。俄、日、英、美、法等国的资本家相继来哈尔滨经商办厂，倾销工业品、输出特产品，国内前来经商谋生的人也不断云集。在市场上形成了以外国资本和民族资本并存，销售外货与小手工业品、土特产品并存，批发商（外商）与零售商（民族商户）并存的格局。东北盛产大豆，所以榨油业在民族工业中居首位。1908年前后，在哈尔滨已有中国人经营的旧式油坊4户，但它设备与技术落后，生产效率低，生产发展受到了限制。到1911年，由几家合资创办了近代工业的机器油坊—东和油坊和成发祥油坊。这两家油坊共有资金13000元哈大洋^①，拥有水榨油机58台，最高日产量豆油12吨、豆饼113吨，利润30—40%。油坊业的高利润刺激了商业资本家向油坊业的投资，因而促进了油坊业的发展，到

① 旧中国吉林永衡官银行发行的哈大洋票。

1914年有5家油坊，拥有各种油榨机243台。民族资本家在黑龙江各地创办了机器面粉公司或面粉厂，到1910年，哈尔滨共有面粉公司11家，在宁安、阿城、双城堡等地先后建立面粉厂。1908年，在俄经商的华侨资本家李祖盛、王联卿和张伯阳分别来哈尔滨买下了俄人经营的歇杰斯制粉厂和第一满洲制粉厂，此后，民族资本家从俄国人手里相继买下了成发祥、安裕、世成泰、东盛、东亚等面粉厂，从而打破了俄国资本垄断哈尔滨制粉业的局面。随着制粉业、制油业、铁路运输和航运事业的发展，机器修理业和铁工业也得到了发展。1912年，民族资本家韩玉璇在哈尔滨独资开办了第一家机器修理厂。1914年民族资本家王秀峰在哈尔滨创办了义升铁工厂。与此同时，在哈尔滨相继出现了德昌、德发、义顺成、聚兴成、义兴成、永兴盛、德兴长、积成等铁工厂。日俄战争后，在黑龙江开始出现较大的商号。例如，1905年哈尔滨山海杂货的老字号一天丰涌杂货店开业。天丰涌的东家兼经理李云亭是河北人。他本来在哈尔滨做小本生意，出售山海杂货。过几年摊床生意积累资金后，与别人合作找个门市房创办了天丰涌杂货店。1907年河北人武百祥以500元羌帖^①在哈尔滨开设小杂货铺，并兼做帽子供本店销售。没过几年生意兴旺，在齐齐哈尔、巴彦等地设立分店。1909年在牡丹江创立了首家杂货商号——“德增永”杂货店。在各县城也逐年增加了各种店铺，例如，1909年在依兰的杂货店、粮栈、山货庄、药行、饭店和旅店等发已展到110余家。从日俄战争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黑龙江民族工商业虽然有所发展，但是由于它资本少、规模小、技术落后，加上在原料来源、销售市场等方面受外国资本和官僚资本的排挤和压制，其发展处于严重畸形和缓慢状态。民族工商业为了求得生存和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同外国资本和官僚资本既斗争又妥协。如

^① 沙俄在东北发行的货币。

1912年以姚明德为会长成立了黑龙江省实业总会。该会明确指出，以振兴地方实业，阻止帝国主义渗透，利用资源发展工商业为宗旨。

1914年，帝国主义国家为重新瓜分殖民地、争夺世界霸权而发动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历时四年多，33个国家卷入了大战的漩涡。欧美列强忙于战争，无暇东顾，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这对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形成了有利的条件，也“给了日本帝国主义以独霸中国的机会。”^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工商业有了迅速发展，到1920年民族资本投资额达42987.4万元，比大战前增加1.8倍，超过了官僚投资超的58%，仅1912年至1919年就有新建厂矿470余家，资本近9500万元^②超过过去40年的总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特别是十月革命后，日本在东北的经济势力不受限于南满，而很快波及到北满。当时，“俄本土之生产工业，均为战时动员，日用物资异常缺乏……而日本货物与美国货物同时运往欧俄。哈尔滨及长春化为日货运俄之中心市场。向来称雄北满的俄国及德国制品，销声匿迹，日本货物竟可起而代之”^③。1918年日本对东北的商品输出额为6945.2万元，比1913年增加一倍多；1918年东北向日本输出额为5849.1万元，比1913年增加60%^④。从1915年到1919年，“满铁”在东北的各项企业投资达1700多万元^⑤。另外，日本在东北各地设立银行，操纵金融市场。日本商人在黑龙江到处办企业，如1914年日本人在黑河办药铺、饭店、理发所、成衣铺等共31家，资金58795元；在萝北县日本商业、医院、妓馆等共有27家。1916年日

① 《毛泽东选集》，第129页。

② 《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③ 哈尔滨满铁事务所编：《北满概观》

④ 满铁经济调查会：《满洲经济和列强经济关系》。

⑤ 《中国近代工业史料》第二辑。

商在龙江县办两家商店。日商茂林洋行到处购买大豆，贩运出境，仅1928年在龙江县就购买了120余石大豆。在日本急剧侵略北满的同时，美、英、法等帝国主义为武装干涉苏俄，也派兵侵入东北，在哈尔滨设立了司令部或办事处，并对北满加紧了经济侵略。美、英、法等帝国主义除了在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处开商埠外，在其它地方也设立分行或企业。1914年在爱辉县除日本商业30家外，还有俄商13家，德、法、美商各1家。1916年在齐齐哈尔就有法商1家，俄、日、英商各2家；在绥化洋商共有15家。1923年美国不仅在哈尔滨、齐齐哈尔，而且在海拉尔、满洲里等处开设了乌利满洋行的分行；1924年法国驻哈尔滨粮业借款公司在齐齐哈尔开设分行。各帝国主义国家除了直接在黑龙江省办厂经商外，外国商人还用同中国商人合资经营的办法，加紧了经济侵略。1919年日本三井公司在哈尔滨以“中日合办”的名义开办了庆云制材株式会社，资本为200万日元；英美烟草公司和美孚洋油公司在呼兰等地开展经营活动。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俄国利用中东铁路和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的航运权，掠夺黑龙江地区的农副产品。据统计，1915年，在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上航行的船只中，属于俄国的有汽船262艘、货船289艘、汽艇80艘，而属于中国的船只只有18艘。俄国为供应军需物资的需要，在各地设立采办处，派中国人去采办、购买粮食、大豆、牛羊等物。因此，中国商人纷纷到哈尔滨为俄国人采办军需物品。当时，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因战争需要，“把满洲储存的西欧商品，从市场上收回而转运到欧洲去，甚至用高价很快买回已售给中国商人的商品”。^①1919年十月革命以后，在黑龙江的帝俄经济势力顷刻瓦解，从而以日本为首的美、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势力逐渐取代了帝俄的

① 《帝国主义在满洲》

经济势力。

黑龙江的民族工商业，不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较快地发展，在战后几年仍在继续发展。在这个期间，除了由于西方帝国主义放松对黑龙江的侵略，由于俄国在黑龙江的经济势力的大减等原因，促使民族工商业大力发展外，人民群众抵制日货运动给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1915年，当日本帝国主义与袁世凯签订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时，全国人民愤起声讨。东北各大中城市迅速掀起轰轰烈烈的反“二十一条”运动，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工人、市民、学生，纷纷集会、讲演、示威游行，甚至小学校的儿童都表现出了排日气氛。有的县城如宾县中学生也行动起来，甚至断指血书以表其竭力救国的决心。在反“二十一条”斗争中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爱国运动，开始于上海，迅速波及到东北。在哈尔滨、长春、沈阳等地，一时间抵制日货的“檄文”四处飞传；买日本货、戴日本帽、吸日本烟者，均视为不爱国的表现，“日本杂货到处失去了顾客”^①。在抵制日货运动中，有些日本商店不得不停业，使日本的商品输出大为减少，为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在黑龙江省的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佳木斯、呼兰、阿城、一面坡等地的民族工商业趁机有了很大发展，正如《呼兰县志》中所说：

“民国以来，洋糖、火磨、火柴等项机汽（器）公司先后开办，率皆利用天然产之丰富，以图与国际贸易相竞争，虽其经营成绩尚未能臻若何优胜，然已一新。”民族工商业者不仅自己投资办厂经商，而且买俄国人的企业，归己所有或同外国人协作办厂。民族工商业以面粉业为主，自己办厂开始兴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面粉业的兴旺，有它的客观因素。从人口和土地开发上来讲，据初步统计，黑龙江省（包括当时属于吉林管辖的松花江右

^① 《满洲现代史》，第155页。

岸广大地区)从1914年至1930年,人口由380万增加到630万,耕地面积由390万垧增加到731万垧,初步形成了松嫩平原、松花江中游、三江平原及牡丹江流域等农业区域。仅黑龙江西部地区,每年销粮约15亿斤。加上,由于世界大战,日本不仅中断了对东北地区的面粉输出,而且在东北地区采购小麦和面粉,俄国在东北地区采购军粮,取消了中俄边境贸易的限制,因而黑龙江的面粉业打进了俄国市场和南满、山东、河北等地,促使民族工商业者兴办面粉业。1913年在北满蒸气面粉厂只有19家,但到1923年增加到38家。清末,哈尔滨仅有3家制粉厂,从1914至1919年,机器制粉厂就增设了12家,呼兰、黑河、齐齐哈尔、双城等地也设了7家。1917年王秉铨创立“哈尔滨安裕面粉有限公司”,其资本30万元。辽宁省营口的民族工商业者也到哈尔滨办厂,如西义顺面粉厂。从1916年到1926年期间,民族工商业者在哈尔滨创建了义昌泰、万福广(后改为东兴)、奉大、天兴福二厂、福兴恒、厚康、裕昌源、天兴福四厂、东盛等制粉厂。这些制粉厂的机器设备较早期俄国人经营的制粉厂要先进一些,生产规模也较大,日产量都2000袋以上(除东盛外),特别是天兴福二厂每昼夜生产能力达4000袋。这些制粉厂的建立,使哈尔滨制粉业生产能力提高了40%。天兴福二厂和天兴福四厂是在解放前民族工商业中较有名气的工商业者邵氏家族办起来的。1905年邵家兄弟到大连经商,到1918年以后,邵家兄弟鉴于北满盛产小麦,在长春、哈尔滨、开原等地相继创建天兴福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制粉厂,逐渐成为拥有千万元资产的邵氏家族天兴福资本集团,堪称东北地区火磨、油坊大亨。1924年邵家兄弟分家,邵慎亭经营天兴福二厂,邵乾一经营天福兴四厂。天福兴二厂生产逐年上升,产销两旺,产品近销南北满,远销京津等地,从1925年到1927年共盈利86.6万元。天福兴四厂于1926年建立新厂,生产“天官牌”面粉,日产量达2000袋。后来又上海恒丰公司购买六台美制脑达

克制粉机，把日产量提高到4200袋，把所生产的“天官牌”面粉，80%销往南满，20%向哈尔滨市、中东铁路各站和关内各地销售。仅两年时间，总资本由50万银元^①增加到100万银元。1928年又在哈尔滨朝鲜银行兑入香坊日满制粉厂，总价25.6万金票，日产面粉5400袋。这样天兴福四厂的面粉日产量达到近1万袋，营业兴旺达到鼎盛时期。有的民族工商业者在俄国人手买下工厂自己经营。这些民族工商业者大部分是在俄国的华侨商人，其中最出名的是双合盛制粉厂。在俄国人中买到面粉厂的有成发祥、世成泰、东亚等归侨商号，这样在哈尔滨，俄国人经营的面粉厂只有三家，结束了俄国人垄断哈尔滨制粉业的局面。海参崴的华侨商人张廷阁，曾于1901年在哈尔滨的义合成杂货店投资五万卢布，立下第一个落脚点后，1913年又在黑河设立一个分号，一方面推销海参崴和哈尔滨的货物，另一方面廉价购买黑河的黄金，为兴办实业准备条件。1915年秋，张廷阁在哈尔滨购买俄国人地烈金的制粉厂，同时买下了该厂原“红雄鸡牌”商标。张廷阁把这个制粉厂改名为双合盛制粉厂，从1916年1月开工生产。由于“红雄鸡牌”面粉曾在欧洲面粉展览会上，以质量优异得过奖，信誉很高，有广阔的销路。张廷阁又投资增加设备和机器，到1917年把原来俄国人经营时的一昼夜生产量从33000公斤提高到72800公斤，翻了一番还多。该厂生产的“红雄鸡牌”面粉含灰尘量为0.3%，而其他厂一般为3%，相差10倍。由于面粉产量、质量优越，1918年3月曾获得旧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的奖励。此后，他购买永胜公司经营的双城堡火磨，又不惜重金从瑞士和德国订购全套新式制造设备，新建厂房，并以高薪聘用外国技师指导生产，到1931年面粉年产量提高到2683万多公斤，畅销国内外，而且处于供不应求的程度。从1914年到1924年，十年

^① 俗称“洋钱”、“大洋”，大型银币的通称。